

新冠病毒的中間宿主：民粹主義、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

鍾明

疾病，尤其是那些能在範圍廣大的人群中蔓延的疾病，具有塑造並改變人類歷史的作用。當人們還對2003年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ARS，俗稱「薩斯」、「沙士」或「非典」)對中國以及整個東亞社會經濟政治生活的影響記憶猶新之際，2020年，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新冠肺炎)在全球範圍造成了史無前例的大瘟疫。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簡稱「新冠疫情」)不僅必將載入人類史冊，而且還將載入人類史冊的每一卷分冊，因為它造成的不僅僅是一場突發性公共衛生危機，而且還促發了波及幾乎所有地方的國家治理危機、國際政治危機、經濟發展危機、社會政策危機、政治文化危機以及思想心靈危機。

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地區，無一例外，都陷入了這場從突發性演變為總體性的公共危機之中，首當其衝的，就是世界最強國家——美國，其次就是前不久還金光燦燦的國家——巴西、印度、俄羅斯和南非。身列「金磚國家」之一的中國，在特定的政治文化和社會民情下，運用「人民戰」打贏了對抗新冠疫情的「阻擊戰」和「總體戰」，但也很快陷入到前所未有的國際政治危機之中。

從2020年1月到9月，新冠疫情已經在全球蔓延數月且並沒有結束之象，甚至在美國等地都沒有減緩之象，依然有不少人視之為突發性公共衛生或應急管理的危機，依然還局限在公共衛生或應急管理的技術性領域中尋找解決方案。不少病毒學家或流行病學家，都在致力於探究新冠病毒從動物傳播到人的中間宿主。即便有不少人的認知超越了公共衛生或應急管理的技術性領域，延展到政治經濟領域，並且廣及國家治理和全球治理視域，但是，依然極少有人認識到，新冠疫情釀成的危機還是一次心靈思想文化的全球大危機。在這場危機中，新冠疫情的中間宿主，既不是蝙蝠，也不是穿山甲，而是無所不在的民粹主義、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

這些思想意識在日常狀態下大多深藏在人們的心中，一旦宣之於口，都會被斥為政治上不正確的非文明之舉。不僅無數戴着隱形文明口罩的精英人

士會避之唯恐不及，或積極主動地、道貌岸然地、義正辭嚴地予以批判，而且那些努力使自己文明化的非精英人士也會學習如何避而遠之。

但是，在危機來臨時刻，當人們的日常生活乃至生計和生存都遭遇威脅之際，套用現代性研究中的一個流行語，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遑論原本並非堅固的隱形文明口罩。潛藏在心靈深處的意識不僅在民眾中大爆發了，而且還登堂入室，進入到媒體輿論，進入到社會生活，進入到政治生活，登上了國際舞台。當然，套用現代性研究中流行的另外一句話，並非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那些深植於人心的、根深蒂固的東西，不僅沒有煙消雲散，而且還像瘟疫一樣，感染全球，震動世界，改變人類歷史。在新冠疫情中掙扎的國家，都深陷民粹主義、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茶毒而不自知。文明的口罩，正如對新冠疫情有防範之效的口罩一樣，固然依然被具有文明意識的精英所佩戴，對民粹主義、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批判之聲也依然不絕於耳，但是，無論是公共衛生意義上的口罩，還是文明意識意義上的口罩，都在民粹主義、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洶湧民情、社會運動和政治操弄的衝擊下脆弱不堪。

一 民粹主義—種族主義—民族主義的三位一體

在某些情況下，民粹主義、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相互滲透、相互影響、相互強化，構成了三位一體。三者都不是宗教，但卻比任何一種宗教，尤其是那些以寬容、平等、博愛為教義的宗教，更加深植人心，而且當三者融為一體時，其攝動人心的魔力更是遠甚各路邪教。許多自詡的宗教信徒，遠非邪教徒，但其心中真正的三合一真神，其實也並非其宣稱所信宗教之神，而是自己所處民眾、種族和民族的優越感；時常出入於神聖宗教場所之行為，其實也並非旨在聆聽神之教誨或懺悔自己心靈和行動的罪過，而是展現某種優越感的程序和儀式。

民粹主義、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都沒有成為意識形態的資質。三者都沒有明確的內涵和外延，沒有思想體系，更沒有特定的組織。其內容，其指向，其擁簇，都是飄忽不定的。學者著書立說加以界定並進行剖析，可是，如果試圖將三種主義當作諸如「信息不對稱」、「多中心治理」、「社群機制」等社會科學術語來處理，甚至當作諸如社會主義、資本主義、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等意識形態來分析，一定會徒勞無功。這三者都是民眾的情感，只不過不是單純的民情，而是一種具有政治魔力的情感。

民粹主義是一種政治取向、政治風格、政治話語和政治手段，體現為從政者以訴諸民眾情感或情緒以打擊其競爭對手的政治邏輯。至於訴諸甚麼情感或情緒，取決於民粹主義從政者在特定語境和境況中準確捕捉民眾中流行的情感或情緒的能力。儘管某些具有民粹主義淵源的意識形態訴諸整體主義

的民眾，即所謂的「人民」，例如自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以來興起的民粹主義民主觀，但顯而易見的是，整體的、鐵板一塊的「人民」並不存在，可被稱為「人民」的選民群體更不存在。因此，民粹主義從政者只不過是訴諸為某種情感或情緒而在特定情境下暫時凝聚起來的部分「民眾」。由於所訴諸的情感及其民眾的不同，民粹主義又有左、右、中之分。

民粹主義者的政治邏輯是反對精英，反對建制，反對權勢。可是，正如他們所依仗的「民眾」飄忽不定一樣，他們所意欲打擊的對象，也是飄忽不定的。當那些在政治上成勢的民眾對科學知識以及專家學者抱有非理性的排斥之時，反智主義也會成為民粹主義的一面戰旗。作為民粹主義根基的「民眾」並非無關緊要，但人類歷史舞台上的表演者卻是那些競逐權勢的民粹主義從政者，那些操弄「民眾」甚至「人民」的政治人物及其知識界同盟。競逐政治權力的民粹主義者一旦成功地把握住部分民眾的社會情緒並取得政治上的成功之後，自己就成為精英階層、建制體系和權勢集團的一部分。儘管始終要面對自我身份認同的麻煩，但只要不斷地訴諸爛熟於心的民粹主義話語，民粹主義的政治手段就能屢試不爽，而這一政治手段的核心招數就是將政治對手或單純的不同政見者貼上「反人民」或「反民意」的標籤。

其中，種族主義就是民粹主義尤其是右翼民粹主義者的內功心法，而且民粹主義政客並不默念內功心法，而是將內功心法不斷地宣之於口，宛若教喻。種族主義在民粹主義民眾的情感心境中自由游走，一切的苦難彷彿都藉此得到了解決。左翼民粹主義者看起來都高舉反種族主義的大旗，或者是政治正確性的捍衛者，但是，這只不過是其民粹主義的政治手段而已。如果蒙受右翼民粹主義種族主義話語打擊的族群並非對左翼民粹主義者利益攸關，那麼後者的反種族主義只不過就是「嘴炮」而已，而他們對這種反種族主義的制度化尤其司法制度化是不感興趣的。政治正確性只不過是另一種政治攸關性而已。

種族主義與民粹主義如影隨形，根本原因在於種族主義以簡單明快的方式揭示了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所有人都會在某些情況下顯示自己與他人的差異，而所有人都難免會對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小心應對。「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在金庸的小說中時常出現的一句言辭，最令人印象深刻，儘管金庸傾其才華塑造的蕭峰（漢名喬峰）以犧牲生命的俠義之舉試圖擊破這一言辭的堅固性。可是，蕭峰的俠義儘管會觸動人心，但卻從未遍及人心，深植人心，更談不上堅固。人與人之間存在着差異，人群與人群之間也存在着差異，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這本是再自然不過的現象。法國社會人類學家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正是由於揭示了「秀異」(distinction) 在人類習俗、語言、文學、教育、審美、品味等實踐、慣習和建制中的作用而卓然成家，而他的作品以獨有的風格秀出了與其他學術作品的差異，尤其是與同時代法國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作品的差異。在政治上，秀異更是無所不在。種族主義民情的宣洩和民粹主義政客的煽動，哪怕為法蘭西政客所為，固然同樣秀出了差異，但是，絕沒有布迪厄所描繪的那種優雅的法蘭西品味。



種族主義基於種族差異來秀異，從而為自身的優越感或苦難感追根溯源。與種族主義的情感高度共情的是地域主義，即基於不同地域生活的人群在經濟社會身份(地位)和文化生活慣習上的差異來秀異。本來，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群，擁有某種慣習，並不奇怪。儘管始終存在着非典型的某地人，但是地方文化、習俗和民情的存在是客觀事實，否則學術界對政治文化、地方文化或城市文化的書寫，都將成為無稽之談。然而，揭櫫差異以求理解、包容甚至融合，或者讚美對方以凸顯自己的差距，或者哪怕是幽默調侃，與訴諸差異以彰顯自身的優越或為自身困境「甩鍋」(推卸責任)，判若雲泥。後一種地域主義話語，與種族主義話語無論在邏輯(思維方式)、語言結構和論說功能上，都別無二致。

地域主義民情和話語，在全球華人中是無所不在的。儘管華人無論如何都屬同一種族，但是，基於地域的族群之分早已從悄然成形變成了大行於世，非我族群其心必異也早已根深蒂固了。這其中，中國大陸人與非中國大陸人之分尤為明顯；「中國內地」或「內地人」，儘管現在已經成為一種習慣用語，但本質上就是這樣一種地域主義族群區分的標籤。相當一部分海外華人、台灣人、香港人以及新加坡華人相對於中國內地人的優越感，正是這種地域主義族群秀異的社會心理根基，而面對中國(內地)崛起而產生的優越感失落，恰恰就是台獨深化和港獨泛起的社會心理根基。青年一代台獨或港獨份子經過大量公開的學習和秘密的培訓之後，自然會用自由、民主、人權作為面罩，但其行為卻難掩地域主義的本相。當去年香港的一些黑衣人對那些顯露出內地人迹象的人(包括一些內地出生但支持其理念的學者)以及非議其破壞行為的其他港人暴力相向的時候，在他們背後的中老年教師(尤其是一些研究自由、民主、法治、公民社會的大學教授)均拋棄自己的科學精神和專業操守，對這些暴力行為選擇性地視而不見。有不少人甚至不少中國內地的主政者認為，只要推進經濟一體化，促使非中國內地人對中國內地或內地人有更多的了解，這種針對中國內地人的族群民情就會淡化。但是，事態的發展證明，這樣的看法(套用一位港星在另一個語境中的一句話)的確是「很傻很天真」。

民族主義在很多層面是民粹主義和種族主義(或地域主義)的提升，但歸根結底還是基於人群差異的秀異，只不過這種秀異是基於民族國家，遠比民粹主義和種族主義秀異的基礎寬廣。大思想家伯林(Isaiah Berlin)將民族主義視為人類基本需要的一種情感反映，即對歸屬感的需要，並探討了自由民族主義的可能性，即基於歸屬感的民族認同或民族國家認同並非一定與自由主義相悖。伯林的睿識在於，他一方面揭櫫了民族主義如何基於人類對於歸屬感的基本需要，另一方面警示世人沒有任何一種東西比一個民族自以為是的幸福感或根深蒂固的優越感更具有毀滅性。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的勃興是否健康，是否有利於自己也有利於他人，全在於是否能受到自由憲政主義的約束，即幸福感或優越感僅僅是自身的享受還是針對他人的武器。

在任何時間和任何地方，自由民族主義或憲政愛國主義都是稀缺的。一般而言，民族主義並不會停留在民眾樸素的歸屬感的尋求，而總會變成一種由政治活動家、社會活動家和思想活動家聯合生產的人為構造物，變成針對他人的武器，成為謀取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的工具。所謂「維吾爾民族主義」的製造者，既不在伊犁也不在喀什的維族百姓之中，而是在烏魯木齊和北京的大學教師之中，更在伊斯坦布爾和柏林的政治活躍份子當中。這種人為構造物，往往能在相關的人群中獲得無以倫比的情感正當性和政治工具性，其政治魔力絕非樸素的民眾情感所能媲美。民眾的情感只有被撩動起來，才會變成主義。只要觀察一下「美國優先」這一口號如何撩動人心，就能對民族主義的政治魔力深有體會。一種相當流行且影響力深遠的學術見解，將民族視為一種「想像的共同體」，將民族主義視為基於想像的人為構造物，現在看起來還是不夠力度。「想像」這個定語，應該被「撩動起來」所取代。民族主義要變成一盤大的生意，必須要把消費者撩動起來。

民族主義政治化的最重要場域之一是民族國家建構中的國家認同政治。對於任何一個新建的國家來說，國家認同建構是最重要的政治事項之一。美利堅民族主義的形成真可謂國家認同建構成功的典範。新中國的國家認同建構，總體來說也頗具成效，僅在少數藏族和維吾爾族當中有一些波折。新加坡的國家認同建構，總體來說同樣有所建樹，而這一努力的核心就在於讓新加坡人自己、也讓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能夠將新加坡人與中國人（尤其是中國大陸人）區分開來，做到這一點對新加坡人（尤其是年輕人）來說並不困難，困難的是如何讓新加坡人特別在意的西方人，尤其是對他國興趣缺缺、地理概念極為混亂的美國人做到這一點。至於說台獨的「國家建構」和港獨的「城邦建構」，目前來看，似乎已經走過了臆想或想像的階段，但其政治努力由於極大地觸犯中國的國家利益和中國人的民族利益以及無助於其他民族或國家的實際利益，而深陷於陷阱或泥潭之中。

民族主義無所不在，在中國內地自然也不例外。當民族主義在中國內地颯興之時，海外華人知識界對此總體上是持批判態度的。其中最極端的批判聲音之一，是把中國的民族主義（或民族主義情緒）等同於納粹德國式的民族社會主義。這樣的批判對於那些非華人民族主義政客來說，自然是免費可得的政治資源。儘管相當一些華人批判者並不持這種極端化的解讀，但大多數論者不僅對於中國的民族主義，而且也對於民族主義本身，持整體性的負面評價。他們的基本看法是，儘管溫和的民族主義是無害的，但是，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終究是一頭難以被理性馴化的野獸，是同自由民主不相容的。因此，對於中國民族主義的颯興，我們唯一應該做的，就是警惕它會給中國人乃至全人類帶來的可能的災難。很多年前，筆者曾經發表論文，從自由民族主義的理性視角，對此批判意識加以批判，以探尋崇尚自由和熱愛祖國兼容的可能性。今天來看，自由民族主義也好，憲政愛國主義也罷，其相干性和緊迫性遠不止及於中國，更是遍及世界各地，尤其是對於那些自以

為踐行了自由民主憲政的國家以及那些揮舞自由民主憲政旗幟的各色人物。給全人類帶來大災難的民族主義，並不是中國民族主義。

二 非宗教性三合一真神與新冠疫情的全球爆發

民粹主義—種族主義—民族主義作為非宗教性三合一真神，其奇妙性不僅僅在於其撩動人心的魔力，而且還在於其反噬性。伯林把受傷的民族精神比喻為彎曲的樹枝：彎曲的樹枝可能會因為外在的壓力過大而被最終折斷，但是如果樹枝的韌性極大，那麼一旦外在的壓力稍有舒緩，樹枝就會以極大的力量反彈，而反彈的樹枝既會打到別人，也有可能打到自己。這種反噬性竟然在新冠疫情的全球大爆發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現。本來，無論是民粹主義—種族主義—民族主義的社會情感，還是政治操弄，受傷的都是他者，可是這一次，這位三合一真神，卻成為流行病學家永遠不會想到的、也無法通過「循證研究」加以確認的新冠病毒的「社會性中間宿主」，而深受其害的，恰恰是這位真神的製造者和操弄者。

讓我們大體上沿着時間線復盤一下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看一看新冠病毒如何將民粹主義—種族主義—民族主義秀出來的差異滌蕩一空。

回想2020年1月20日，當中國政府將新冠肺炎納入法定二級傳染病名列，並按一級傳染病啟動全國性的應急管理之時，極少有人會預想到今天新冠疫情全球大爆發的情形。當時，有英國研究團隊基於公開的病例數據建立疫情預測模型，顯示未來（中國的）確診人數可能多達五千人，這一預測還被當時中國內地疫情防控專家嗤之以鼻，稱這個數字不過是預測區間的高限而已。恐怕少有的「事前諸葛亮」要數英國皇家醫學院外籍院士、香港大學病毒學家管軼。1月23日，武漢實施了「封城」措施，管軼在接受「財新網」的採訪時做出了一個判斷，即此次疫情比SARS要嚴重，感染規模可能會是SARS的十倍起跳。

然而，短短幾天內武漢以及湖北疫情的爆發震驚全中國，當然也驚動了全世界。僅僅兩周的功夫，中國內地的疫情就已證明，事態超出了管軼的預測。對於新冠疫情在中國內地的大爆發，境外輿論尤其是西方輿論固然震驚，但也基本上處於隔岸觀火的狀態。在他們看來，這只不過是一場發生在東方古國的危機，而這種公共衛生危機在這一國度爆發，並不令人感到奇怪，一來這是一個公共衛生體系脆弱的國家，二來這個國家的民眾對於野生動物入饌有着異乎尋常的熱情。想一想十七年前，不正是因為廣東人愛吃果子狸而導致SARS的爆發嗎？這一次，對了，新冠疫情爆發的罪魁禍首，就是那些喜歡喝蝙蝠湯或吃蝙蝠刺身的武漢人。

幾乎所有人，包括無數中國內地人，在新冠疫情的早期，都基於這樣一種地域主義的刻板印象，完成了對新冠疫情的「病原溯源」。「武漢病毒」或「武漢肺炎」的名號鵲起，在香港、台灣和海外華文媒體尤為流行。這種刻板的思維廣泛流行於中國內地的各界精英之中。中國內地的傳統媒體和新媒體（微信

公眾號)發出了一篇又一篇抵制食用野生動物的倡議。有中國內地的教授甚至相當自信地提出，如果嚴格執行《野生動物保護法》，武漢的新冠疫情可能就不會發生。早在2月10日，中國內地的立法部門就對輿論做出回應，啟動了徹底禁止非法野生動物貿易的立法進程，成為對於新冠疫情最早的立法反應之一。中國內地的野生動物養殖產業一夜間崩塌。儘管當時有人表示狐疑，武漢人並不熱衷於食用野生動物，而對於作為「美食」的蝙蝠湯或蝙蝠刺身更是聞所未聞，可是，在新冠疫情的初期，中國內地媒體對於食用野生動物的「文化陋習」所展開的大批判，其規模和激情堪比很久以前發生過的針對「醜陋的中國人」的文化大批判。

很快，當新冠病毒來源明顯有疑，當種種迹象表明武漢作為新冠疫情的第一個爆發地並不一定是新冠病毒的發源地(即武漢疫情很有可能是一種輸入性疫情)之後，而且種種迹象表明新冠病毒不僅有多個發源地，其本身也有多個變種，儘管世界衛生組織(WHO)以及多國的專家信誓旦旦地宣稱新冠病毒來自野生動物卻又始終無法給出起碼的循證依據，針對中國陋習進行文化批判的眾聲喧嘩在中國內地開始消褪。可是，香港一位著名的微生物學家、亦被公認為香港首要防疫學家的學者3月依然在港媒上對「武漢病毒」開展文化批判。這位學者後來撤回其文，但依然辯稱其無意捲入政治，而是致力於科學探究。可是，值得追問的是，這樣的「文化批判」究竟來自哪一種「科學的」視角？這樣的文化觀察究竟有無循證的依據？捲入政治，哪怕是文化政治，並不可怕，也不是罪惡，但遮掩或否認自己的政治價值觀或文化政治價值觀，同時無視別人的政治價值觀或文化政治價值觀，固然還夠不上罪惡，卻與科學精神和專業主義相去甚遠了。

然而，存在於大量個體頭腦中的刻板思維，通過某種普遍存在的秀異行動，哪怕是在微觀的個體層面展開，都會產生令人意料不到的宏觀後果。謝林(Thomas Schelling)在2005年以政治學家身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曾經發表過一篇極具震撼力的博弈論論文，揭示如果一定數量的民眾，哪怕僅僅是出於維持自己的生活習慣而搬離有他族鄰居的社區，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族群隔離式的社區格局就會形成。新加坡政府在公共住房(當地華語稱之為「組屋」)的治理中，依照人口中的族群比例確定組屋在不同族群中的分配比例，從而維持所有公共住房社區的種族多元性，這一治理措施為謝林的博弈論推演提供了反向的實證依據。在新冠疫情中，習以為常的微觀行為產生意料不到的宏觀後果，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展現出來了。在意大利，極度自信的民眾普遍相信疫情就是中國人衛生習慣不好所致，尤其是中國人愛吃老鼠；對於當地華人以及其他亞裔人士戴口罩以防疫情之舉，調侃、嘲笑、攻擊無一不有。威內托大區政府首腦扎亞(Luca Zaia)2月下旬在一次採訪時竟然將民眾普遍的認知宣之於口，不僅引發軒然大波，也迎來中國大使館的抗議。扎亞旋即致函中國大使館表達「歉意」，但其致歉函在意大利百姓的解讀下實際上就傳達了一個意思：我不是種族主義者，但你是中國人。值得注意的是，相當一部分意大利人尤其是北方人，也常常用同樣的口吻調侃挖苦諷刺意大

利南方人，尤其是那不勒斯人。美國紐約州州長在當地疫情大爆發之後也坦承，他早期的確堅信新冠疫情只是「黃種人」或「中國人」的瘟疫，不會擴及自己治下的地盤。日本副首相兼財務大臣麻生太郎3月下旬在歐洲疫情大爆發的背景下，在議會回答詢問時以諷刺和調侃的口吻「爆料」說，在2月末，他前往沙特參加二十國集團(G20)財長與央行行長會議，在會上曾表達過各國合作對抗疫情的提議，不料不但遭到西方國家的冷漠反應，而且還遭到群嘲，稱西方不會發生疫情，這是「黃種人」的病，不是西方人的病。麻生太郎及其同僚自然對西方人對於「黃種人」的偏見表示不屑，但他自己也在多次採訪中時常流露出對他國國民素質的不屑，頗為自負且自得地表示日本疫情防控的成就完全得自於日本人無以倫比的良好衛生習慣和國民素質。然而，無情的事實是，被壓低的疫情曲線無可避免地被拉長了，日本疫情始終無法掙脫泥沼，到了8月底，在很多國家和地區出現第二波疫情之際，日本的流行病學家依然為本國究竟是否處在第一波疫情的問題而糾結。

面對新冠病毒的挑戰，幾乎沒有甚麼事情不被打上打上民粹主義一種族主義一民族主義的烙印。口罩就是其中一例。在新冠疫情的初期，除了中國(包括台灣、香港、澳門)、日本和韓國等少數東亞國家和地區之外，幾乎所有地方都對佩戴口罩的行為嗤之以鼻。即便是WHO、加拿大首席公共衛生官譚詠詩(Theresa Tam)、美國政府公共衛生顧問福奇(Anthony S. Fauci)、英國政府、新加坡政府等，都曾不建議民眾配戴口罩，但後來全部改口，並實施公共場所佩戴口罩強制令。如果說在疫情早期因擔心口罩供給不足而給出相關建議，那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在西方國家以及受到西方深刻影響的非西方國家，無數頂級公共衛生專家竟然炮製出一些煞有介事的說辭(例如佩戴口罩會產生虛假的公共衛生安全感反而不利於疫情防控等)，完全與其講究因果鏈探尋的循證研究專業訓練背道而馳。即便在口罩強制令實施之後，以自由之名抗議口罩強制令的個體行為和集體行動，在西方各國可謂無日不有。不喜歡佩戴口罩的民情經由民粹主義個體和集體行動發酵，再輔之以口罩秀出中國人(或「黃種人」)膽小懦弱而自身康健勇敢之差異的種族主義心態，如果不是新冠疫情在西方國家大爆發的根本原因，至少也是助燃劑。

「封城」是另一個例子。1月23日，武漢實施了「封城」措施，世界震驚。《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連續發布推文(tweet)，點評中國「封城」給人民的生活和自由帶來了巨大損失；但是，對於意大利實施的「封城」措施，卻評價為甘冒經濟風險以遏制新冠疫情的壯舉。一些國家(例如丹麥)對於中國「封城」一開始顯露出譏諷之情，但很快，當自身疫情惡化時，卻迅疾學而習之。面對類似的「封城」乃至「封國」之舉，中國被譏諷為對中世紀公共衛生措施的沿襲，而新西蘭則被視為現代化抗疫的典範。這樣的思維即便是在公共衛生專業學者那裏也不鮮見。在疫情爆發初期，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有學者發布研究報告，對中國「封城」的公共衛生意涵淡而化之，卻竭力突出了抗疫的「新加坡模式」，即並不採用「封城」式的大規模社會隔離措施，而是基於循證分析，迅速發現確診病例，迅速追溯密切接觸者，實施精準化的個體

隔離措施。這份研究報告的秀異式結論在中國內地也頗有共鳴，因為秀異式心態自然在中國內地也無所不在。大量自媒體以「佛系抗疫」命名新加坡抗疫模式並予以讚揚式的報導，中國抗疫期間湧現出來的「網紅」醫生張文宏以少林剛猛和武當陰柔來形容中國（內地）與新加坡抗疫之舉的差異。但是，不久之後，當來自歐美各地的病毒悄然潛入新加坡之後，「佛系抗疫」破功了，陰柔之力無效了。

本來，面對疫情，由於民情和國情（域情）有所不同，不同國家（地區）採取不同的抗疫模式，或者在不同時期以及疫情情況不同時採取不同的策略，乃是天經地義的。但是，將不同的抗疫模式民粹化以至政治化，那就絕非天經地義了。中國的民粹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為全世界人民為甚麼不抄中國的「作業」而操碎了心，而西方或準西方的民粹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一方面視中國的「作業」如糞土，但另一方面也悄悄地參考其答案。西方或準西方世界一致蔑視中國視面子大如天，而他們自己何嘗不是時刻不忘秀一下傲嬌之情。

國際旅行限制令是第三個例子。在疫情爆發初期，很多國家和地區的民情洶湧，認定這是一種「中國疫情」，認定只要對來自中國的人實施旅行禁令，就可萬事大吉。很多國家的政府，無論出於何種考量，均堅定有效地採取了這一行動。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J. Trump）多次大言不慚地自誇沒有人比他更懂疫情，而他很早就採取了堅定有效的防疫措施，即自2月2日美東時間開始對過去十四天內到訪過中國的外國人實施禁止入境令。這或許是他唯一靠譜的防疫措施。可是，當新冠疫情在世界各地大爆發之時，尤其是在歐洲國家出現湖北之後的第二輪大爆發之際，許許多多國家和地區，嚴防「中國疫情」的潛意識沒有絲毫動搖，但對於來自歐洲以及後來居上的美國的潛在病毒攜帶者竟然從未嚴防死守。

在這一點上，俄羅斯「戰鬥民族」的抗疫表現尤其令人驚訝但並不令人意外。眾所周知，俄羅斯與中國在國家關係和民間關係上的差別極大。在中國，對俄羅斯文化心嚮往之者大有人在，這一點既是正常的，也是正當的；但在俄羅斯，對中國或中國人鄙而視之者也大有人在，同時，俄羅斯儘管在政治上始終與歐洲處在民族主義對抗的格局之中，但在思想意識上卻始終對歐洲敬而仰之。在疫情爆發初期，俄羅斯從政府到民間都發揮「戰鬥民族」精神，對可能的中國病毒源嚴防死守、蠻橫處置之舉時有發生。但是，在緊閉面對中國的前門之後，俄羅斯卻對歐洲疫情疏於防範，以致新冠病毒從歐洲後門湧入，致使俄羅斯最終名列疫情危重的五大國家之一。

在這方面，香港發生的事情則既不令人驚訝也不令人意外。本來，香港特區政府很快針對來自中國內地的人在邊境口岸實施測溫等疫情篩查措施，呈現出遠超絕大多數內地城市的風險防控意識。但是，當中國政府自1月20日啟動疫情應急管理之後，香港特區政府沒有如朝鮮、新加坡、俄羅斯政府那樣迅疾採取針對源自中國內地的旅行禁令，也就是港人俗稱的「封關」措施，直到2月4日才在社會的壓力下被迫實施進一步的「封關」，甚至晚於特朗普的類似行動。這一令人匪夷所思的延遲，在筆者看來，真可謂香港特區政府在疫情

防控中最大施政失誤。事實上，在1月20日之後，內地很多地方採取了很多頗具「搞笑」色彩的土辦法對來自湖北的人員實施「封關」，無論是城際還是城內的人員流動已經急劇降低，香港特區政府2月4日宣布的「封關」措施實際上僅有象徵意義，針對的是港人輿情，而香港一批醫護人員一方面採取罷工之舉，置亟待醫療救治的患者於不顧，另一方面組織並積極參與以「封關」為主要訴求的抗議活動。我很懷疑這些脫離醫護一線的「專業人士」是否因不諳希臘語而沒有讀過《希波克拉底誓言》。這些「專業人士」從未在獲悉歐美嚴重程度遠甚於中國內地的疫情爆發之後組織過類似於針對中國內地的「專業性」抗議活動，在港獨甚囂塵上的大背景下，這樣的雙重標準行為很難沒有民粹主義、地域主義和偽民族主義的心理支撐。不論版本如何，民粹主義—種族主義—民族主義的反噬性結果，就是香港爆發感染源來自歐美的第二波疫情的原因之一。

7月初以來，香港又爆發了第三波疫情，病例不斷增加，源頭無法找到，病毒出現變種，而唯一可以確定的是，這一波疫情與內地完全無關。當香港特區政府要求中央政府派專業人士馳援香港抗疫之後，一批「專業人士」再次開展針對內地的抗議行動，其中的理據之一是特區政府為甚麼不針對內地來港人士實施隔離。可是，這些「專業人士」是否提議過對來自歐美疫情高風險地區的人士例如機組人員，實施嚴格的隔離措施，並為此開展過類似於針對中國內地人士的抗議行動呢？他們只是在確證來自歐美的機組人員中有確診病例之後，才開始關注到有三十類外來人士可以豁免隔離。當這些「專業人士」的訴求是無論疫情如何，對來自內地的人士一律採取隔離措施，那麼為甚麼不一視同仁地要求無論疫情如何，對來自所有國家和地區的人士都採取同樣的隔離措施呢？此等邏輯下的訴求明顯毫無專業性可言，倘若實施，香港一定會變成國際孤港。他們的專業憑證究竟是醫學院或公共衛生學院的學位證書，還是西方（尤其是美國）主持的民粹主義集體行動訓練營的結業證書呢？

第四個例子是新冠病毒的名稱。前文已述，在新冠疫情的早期，海外華文媒體大多使用「武漢病毒」之稱謂。當WHO以及國際病毒分類委員會（ICTV）等專業組織確立了新冠病毒的正式名稱，並且明確反對將病毒名稱與地名、國名或族群名掛鉤的不專業之舉後，海外華文媒體依然沿用「武漢病毒」之名，如果真如香港那位著名學者所宣稱的那樣是出於習慣的話，那麼這樣一種習慣難以同民粹主義—地域主義—偽民族主義的慣習擺脫干系。

當然，對於非華人來說，「武漢病毒」之稱謂是不過癮的，因為大多數這類人士根本不清楚武漢在哪裏。於是，他們製造並在西方以及深受其影響或主宰的非西方世界傳播了「中國病毒」。無論是加拿大、丹麥、德國、法國、澳洲還是美國，都是「中國病毒」的製造者和傳播者。特朗普及其執政團隊成員，更是「中國病毒」的超級製造商和推銷員，特朗普甚至還發明了「功夫病毒」、「熊貓病毒」，美國的駐外大使還在與中國萬里相隔的國度（例如冰島）推銷「中國病毒」。

所有這些國家，如果出現了針對女性、少數族群、特定宗教信徒甚至移民的哪怕是不敬之嫌而存疑的話語之時，必定有「政治正確」的輿情加以遏制，

但是，針對中國的種族主義話語，即便確定無疑，也有「政治正確」的「言論自由」神功護體。疫情或更為一般的公共衛生危機在任何一種政治體制或意識形態下都有可能出現並爆發，但西方媒體對中國的攻擊一旦伴以標上「自由」、「民主」、「人權」名號的「八荒六合唯我獨尊功」，便擁有了持之以恆的「政治正確性」。

西方新聞界並非如1947年〈赫欽斯委員會報告〉（“The Hutchins Report”）所期待的那樣，成為“A Free and Responsible Press”——西方新聞界固然自由，但並非負責任。在西方新聞界，關於中國的報導，特朗普口中的「假新聞」（fake news）充斥；對於中國的評論，很多都在反對專制的幌子下帶有種族主義色彩，例如，在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和致死病例都幾十倍於中國的背景下，美國主流媒體《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出現了以〈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的評論文章。當這樣的文章引發中國政府、內地媒體以及美國十一萬多通過白宮網站的聯署之時，在曾經誕生以《萬里長城永不倒》為題直面「東亞病夫」污名之名曲的香港，卻很難激起漣漪。非常奇怪的是，一旦有些媒體出現零星的略微持平的中國報導時，美國政界必定出現這些媒體被中國「收買」的指控，而據稱暗享人民幣好處的媒體，除了大名鼎鼎的有線電視新聞網（CNN）之外，竟然還包括美國政府自己興辦的「美國之音」（VOA）。

第五個例子是針對中國的索賠言辭和行動。這樣的言辭，出現在意大利，出現在英國，出現在法國，在美國更是甚囂塵上，密蘇里州的政客還煞有介事地將索賠案訴諸法院。這樣的言辭和行動，在事實、理性還是在法律層面的荒謬性是無以復加的，這一點無需贅言，但作為民粹主義政治策略卻無比高明、無比靈驗、無比有效。有美國的民調顯示，超過三分之二的受訪者認為中國「糟糕的抗疫表現」至少應該為全球（包括美國）疫情的大爆發負有一定的責任，當然這部分民眾中也頗有一些人認為對美國疫情負有主要責任的應該是「特朗普病毒」。美國民主黨的政客當然對共和黨以傳播「中國病毒」來「甩鍋」心知肚明，對於「特朗普病毒」這一說辭的傳播也樂而為之，但絕不會對涉及中國的真相以及澄清誤會有任何興趣。

索賠論煞有介事的理據，是中國政府在武漢或湖北疫情早期對於新冠病毒人際傳染性的隱瞞。事實上，在中國內地，這一問題同樣引起了廣泛的議論。進入2月之後，針對疫情爆發的文化批判很快被治理分析所取代。眾多中國記者、學者和其他文字工作者（主要是自媒體人）很快便以多元的視角、從多維的領域，對內地新冠疫情的治理失靈展開分析。這些分析主要針對的是內地面對未知疫情的早期風險預警機制和公共衛生應急響應機制。有經濟學家基於公開信息，以抽絲剝繭般的福爾摩斯探案功夫，用數萬字連載文章還原武漢地方政府無視、漠視甚至試圖遮掩那些原本可以辨識並加以公開的疫情風險信息，引爆以微信公眾號為載體的海內外中文網絡世界，並在學刊上發表論文，運用激勵機制的數理分析揭示中國內地疫情防控體制的弊端。有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院士級的流行病學家在接受內地官方媒體採訪時坦

承，不少地方政府出於各種地方性政治經濟社會利益的考量（例如爭取「衛生城市」名號）會傾向於掩蓋負面信息，包括對顯露出來的疫情迹象加以淡化處理。有內地記者無懼健康風險，深挖內地疫情防控的各種短板，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內地投資數億元建設起來的「橫向到邊」（即橫向到邊疆）、「縱向到底」（即縱向到基層）的將不明肺炎納入其中的傳染病呈報系統，在新冠疫情早期預警階段失靈二十八天的細節，在新興媒體和傳統媒體的協同努力下，大白於天下。大量學者撰寫並發表了大量論文，尤其是關於地方治理的短板以及中央與地方關係在地方治理中產生的負激勵所導致的疫情風險確定和應急管理決策上的延遲，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筆者早在2月10日就完成並正式發表了基於行政機制與社群機制關係的視角剖析有關湖北疫情早期風險預警治理失靈的學術論文，並在2月底發表了對中國疾控中心組織和制度的分析，並批判了對其改革的「行政化」的主張，在自媒體世界產生了點擊量10萬+的反應。

西方新聞界對這些事情，極為無知。在他們眼裏，彷彿中國學者和記者都是政府的宣傳員。當然，毋庸諱言，中國內地的媒體，對政府以強有力的行政動員手段抗擊疫情及其成效進行了大量報導，有些新興的自媒體還以前所未有的科技手段對某些抗疫場景（例如武漢方艙醫院的建設）進行雲直播。在這些報導中，自然不乏民族主義自豪感的展露，也不乏民族主義優越感的宣洩。可是，此等優越感的宣洩，無論是就攻擊性還是就愚蠢度而言，都無法與其西方同輩相比肩。事實上，無論是在武漢還是中國其他地方，除了出現小規模疫情的地方之外，社會經濟生活均已恢復正常。在筆者所居住的杭州，那些口碑不錯的餐館在周末均已經出現排隊等座的現象，「社交距離」即便有，也大幅度縮短了。當一些西方媒體對武漢等地社會經濟生活回復正常進行報導之後，竟然有大量西方人士相信，這都是中國執政黨和政府「擺拍」的結果。他們不願意也不接受那些與其偏見節拍不合的信息，這倒是符合行為經濟學所揭櫫的人類行為通則。在他們看來，在中國這樣一個公共衛生體系糟糕、民眾衛生意識差勁、政府並不公開透明的國家，新冠疫情絕不可能平緩，更不可能平息；簡言之，美國做不到的事情，中國也絕對做不到。

三 抗擊民粹主義、種族主義、民族主義的 歷史永遠不會終結

其實，治理失靈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刻以及任何政治體制下都有可能出現。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早在疫情全球大爆發的初期就斷言，世界各地抗疫績效的差異僅僅體現了治理能力的差異，而與政治體制無關。中國內地在疫情早期的確出現了短暫的治理失靈，而這一失靈體現了中國公共衛生體系和公共治理體系都存在着短板，而中國執政黨和政府也號召內地的專業人士和科學工作者針對如何補齊短板進行深入的反思和研究。

無論是中國政府還是媒體或學界，在新冠疫情早期以各種形式向世界公開的信息可以用海量來形容，這些信息足以彰顯疫情的嚴重性。西方國家明明目睹了中國發生的一切，竟然在兩個月之後，無一例外地出現了疫情大爆發。而且，在絕大多數歐美國家以及民粹主義政治主宰的非西方國家（例如巴西、俄羅斯、印度等），疫情爆發烈度都遠遠甚於中國。在這些國家，出於各種理由，對疫情輕視、隱瞞甚至進行欺騙，無處不在，無奇不有。當美國以歇斯底里的方式指控中國疫情防控不透明之時，其在美國本土、中亞地區以及韓國的軍方生物實驗室卻始終對外界（哪怕是盟國以及本國非相關人士）關閉。武漢病毒研究所接待了包括美國調查人員在內的訪客，但美國政客卻以其調查人員總有沒有看到的東西為由，繼續對該研究所的「不透明性」加以指控。為民粹主義—種族主義—民族主義三合一真神所指引的美國政客，竟然不具備區分沒有窗戶的鐵壁黑屋和打開窗戶的尋常建築的思考能力。這樣的天下奇聞，世界各地以英語為語言媒介的媒體，包括香港的媒體，固然一向以獵奇為能事，但卻視而不見。

幾乎所有的西方國家都把新冠疫情本土大爆發的責任指向中國在2019年12月中下旬或2020年1月中上旬所犯的錯誤。世界上還有比這更加荒唐的事情嗎？相信這種說辭的人有任何正直性可言嗎？製造並相信這些說法的人是真正的基督徒嗎？西方只有極少數媒體從業人員，如醫學期刊《刺針》（*The Lancet*，內地譯名為《柳葉刀》）主編霍頓（Richard Horton），能夠正確認識到這一問題，並著書立說，痛責西方政客的愚蠢。

真正應該受到嚴厲譴責的，是西方政客和西方媒體，以及大量被民粹主義洗腦的民眾。當西方媒體嘲笑中國人被中國政府洗腦的時候，其實他們自己恰恰既是民粹主義—種族主義—民族主義洗腦的施為者，也是洗腦的受害者而不自知。如果說早期中國有些地區或部門對疫情風險的漠視甚至隱瞞，可以為政治科學中既有官僚制教科書的科學發現提供新的註腳，那麼世界各地尤其是美國政府對疫情的輕視、隱瞞甚至欺騙，完全為政治科學的學術探究開闢了全新的領域。幾乎所有發達國家（似乎只有新西蘭例外），均出現了程度不等的治理失靈，而美國恰恰在治理失靈方面領先於全球。治理失靈的「美國優先」必將作為一個極為糟糕的記錄而載入人類的史冊，同時也將成為未來公共管理和政治科學教科書中的重要篇章。

民粹主義、種族主義、民族主義的人類歷史，永遠不會終結；人類抗擊民粹主義、種族主義、民族主義的歷史，也永遠不會終結。只要人類還存在，關於民粹主義、種族主義、民族主義的學術書寫，必將出現新的篇章。就瘟疫而言，原本處在自然科學範疇中的傳統流行病學，將為一種全新的政治經濟社會流行病學所超越。新冠疫情，改變了人類歷史，改變了學術格局，自然也將改變學者的生涯。

顧 昕 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社會治理研究院首席專家，民生保障與公共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北京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高級客座研究員。